

中共党史 若干理论研究

■ 谷丽娟 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D23/G461

中共党史若干理论研究

谷丽娟 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党史若干理论研究/谷丽娟著.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03.12

ISBN 7-81076-521-3

I. 中... II. 谷...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理论研究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7263 号

责任编辑: 李兴贵

封面设计: 彭 宇



NEFUP

中共党史若干理论研究

Zhonggong Dangshi Ruogan Lilun Yanjiu

谷丽娟 著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和兴路 26 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44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7-81076-521-3

D·67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它从 1921 年成立开始，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中间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其间也曾经历了 1927 年和 1934 年两次严重失败，但党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了这两次右的和“左”的错误，经受住了这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在 1949 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正是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同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产生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后，又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产生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适应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却逐渐走入了困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严重错误后，即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之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从而实现了党的理论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承前启后，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解决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

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搞好党的建设的问题。

本书绝大多数文章是作者多年来在全国性学术会议或国家二级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有少量是由原来没发表的研究成果编辑而成的。这些论文主要是作者对党在各个时期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尽管它只是沧海一粟，但一滴水亦可折射出太阳的光芒。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党理论上的三次飞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党，她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领导着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著 者

2003 年 8 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东北抗日策略	(1)
正确评价“一·二六”指示信	(1)
“一·二六”指示信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	(18)
“一·二六”指示信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27)
论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	(40)
正确评价“六·三”指示信	(51)
第二部分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62)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6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国际与东北党	(75)
论共产国际与东北抗联受挫的原因	(84)
东北党组织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	(90)
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命运的转折	(102)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一个根本性失误	(113)
第三部分 西安事变	(118)
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	(118)
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	(128)
驳张国焘对西安事变历史的篡改	(135)
国共合作的新篇章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	(152)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性贡献·····	(162)
西安事变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尾 ——也评张学良陪蒋回宁·····	(177)
张学良宣读不抵抗电报考·····	(185)
第四部分 过渡时期 ·····	(192)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过渡时期的区别·····	(192)
论“大过渡”理论的失误·····	(200)
论我国过渡时期的成功经验·····	(212)
论“三反”运动的历史性启示·····	(220)
论粮食统购统销·····	(229)
第五部分 社会主义建设 ·····	(245)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245)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现·····	(259)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认识的深化·····	(275)
“八大”路线中断原因探讨·····	(281)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与实践·····	(299)
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	(306)
第六部分 改革开放 ·····	(318)
整党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措施·····	(318)
谈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	(325)
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333)
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	(346)
坚持改革,迎接挑战·····	(349)
第七部分 国共关系 ·····	(354)
试评两次国共合作中的国共两党·····	(354)
国共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364)
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	(371)
中共对台政策论·····	(384)

第八部分 随笔.....	(393)
论“九·一八”东北丢失的责任	(393)
正确认识“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	(404)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	(410)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剿匪.....	(418)
对中国工人阶级特殊优点的看法.....	(426)

第一部分 东北抗日策略

正确评价“一·二六”指示信

1933年1月26日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通常所说的“一·二六”指示信（以下简称指示信），是研究东北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引起了史学界的充分重视。目前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它首次明确提出了在东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下层统一战线口号具有质的区别，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开始在局部地区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的指导思想，对转变东北的形势，对团结各阶级、阶层、各种反日力量，建立东北抗日武装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笔者依据自己的研究，认为这种评价是值得商榷的。指示信从主流方面看，仍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继续，指示信中提到的“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还是关门主义的传统政策——下层统一战线，根本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指示信是1932年底由王明起草的，并经以王明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讨论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给满洲省委的。

众所周知，当时共产国际仍然执行着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该策略在1931年8月27日至9月15日的执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中又明确重申了一次。共产国际正式脱离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是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这距指示信发出已两年多了。也就是说，指示信发出之时，并不存在摆脱下层统一战线，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国际条件。

中国共产党内，当时正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王明无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现实，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仍局限于下层，犯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对出现抗日要求和愿望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其他中间派别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仍把他们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拒绝和他们联合，甚至把这些派别的代表人物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而予以孤立和打击之，根本不存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国内条件。

我党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是1935年8月1日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正如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所说：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以后，“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党在八月一日发表了号召建立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日

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

二

“一·二六”指示信是为贯彻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决议而做出的。

首先，指示信本身就多次明确说明自己在重申全会决议的重要内容，并一再强调其重要性。“事实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用革命方法解决满洲问题总策略的方向正确，以及根据这个策略方向而规定的及由其中产生出来的总政治口号的正确”，“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问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同情”。指示信最后用了“我们相信满洲的党和全体同志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案……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以这种号召式的句子做结尾，说明指示信是为贯彻全会决议而做出的。

其次，指示信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与全会决议是一致的。这不单表现在后面还要提到的一些内容上，而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对形势的估计，争取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推翻国民党政权，夺取黄色工会中的工人群众，发展游击运动，在东三省提出抵制捐税和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走狗的财产，组织选举的人民政权，普遍宣传苏维埃区域的成绩，武装保卫苏联等，都完全一致。

再次，从时间顺序和间隔的长短也可推断出指示信和全会决议之间的联系。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是1932年8月27日

至9月15日召开的,指示信是1932年底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全体会议在共产国际是十分重要的会议,它决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方针政策,各国共产党及其驻国际的代表团历来十分重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也不例外。会议一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立即于9月份派孙广英以东满巡视员名义到东北贯彻全会决议精神。

最后,就组织关系上也决定了指示信产生的必然性。当时的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方针,甚至领导成员的组成,控制都是很严的。对中国共产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之前,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则还要晚些。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遵义会议前,中共的路线方针和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一致的。指示信产生和发出之时,又正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登峰造极地步之时,王明自称“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忠实”^①,他不会不努力在中国共产党中去贯彻全会决议的;东北的情况又很特殊,共产国际对日本侵占东北这一行动的目的判断为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苏联,“把满洲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对华战争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②,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③。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除给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些有关指示外,就是对东北地区的情况特别关心,对东北党的工作尤为重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除通过驻在海参崴的中共代表团工作机构了解东北情况,向东北党发指示外,还不断派人来巡视东北党的工作,考察东北党组织,直接给东北党组织下达文件和指示。到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干脆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要中央不要再管东北地区今后的工作,而由中共代

① 王明:《中国现代与中共任务》,1933年12月。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184、168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32~1933年,第383页。

表团直接负责领导，即要完全接管对满洲党的领导工作。事实也是如此。红军开始长征后，党中央与东北党组织便完全失去了直接联系，东北党的工作完全归中共代表团领导，直到1937年末王明离开莫斯科为止。这种组织上的关系，也使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后，应该也必须尽快在自己直接领导的东北地区贯彻落实全会决议精神，尤其是全会决议规定的关于东北党的任务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上比关内特殊，专门发指示信就更属必要的了。“一·二六”指示信的发出便属自然和正常的了。

认定了“一·二六”指示信是为贯彻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而写的，就抓住了分析研究“一·二六”指示信的纲，也就能拨开目前学术界研究“一·二六”指示信出现的一股迷雾，很多问题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共产国际从执委第十次全会开始的“左”倾政策，到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会发展到了顶点，开始抛弃“左”倾政策是第十三次全会以后的事。“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仍忽视中国的各阶级和各党派政治态度的变化，及其要求救亡反对妥协的强烈民族情绪，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十二、十三次全会所通过的有关决议中，进一步推行“下层统一战线”，即“左”倾关门主义策略。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就盲目要求我党“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广泛而彻底地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下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完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国民党”^①。这就显然可以总结出，“一·二六”指示信中沿用的是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而没有提出哪怕是初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资料》第2辑，第185页。

至于王明，人所共知是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只能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怎么可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根本策略上比共产国际还先转变呢？事实是，1934年七八月，共产国际七大筹备会酝酿要转变统一战线策略时，王明还顽固坚持下层统一战线政策，还对这种转变不理解，认为“社会民主党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靠山”，“右倾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①。王明是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的帮助下才转变立场的，而不是在这之前。更何况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即使王明想要转变也不可能。

三

“一·二六”指示信中提的是“反帝统一战线”，从其内容看，依然是“左”倾关门主义的传统政策——下层统一战线，没有提出哪怕是初步意义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一·二六”指示信把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摆在并列的位置，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一再强调“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指示党在满洲“必须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东北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已基本上被排挤出东北了。指示信不顾这一事实，依然要求满洲党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但可以看出“一·二六”指示信教条主义气味之浓，而且和主张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联合对中国抗日抱同情、援助或善守中立的一切国家和民族，以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现出了原则的区别。

“一·二六”指示信重申了“推翻国民党这个背叛民族羞辱民族的政府，是武装民众顺利进行反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① 索伯烈夫：《共产国际历史纲要》，第359页。

战争，来保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的条件”。在东北，“一·二六”指示信发出时，国民党政权早已溃散，教条式地重复共产国际这一“左”的策略是不对的。这和“反蒋抗日”的口号还不一样，在蒋介石大举进攻苏区的情况下，反对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组织武装力量来反击蒋介石的“围剿”，这时反蒋是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不反蒋便无法抗日。但是，当时的中国革命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当时事实上也并不具备在短期内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足够力量。因此，在民族危亡之秋，把推翻国民党政权作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前提是不现实的，是“左”倾的，也是不妥当的。“一·二六”指示信重申了这一政策，又表现出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本质的不同。

“一·二六”指示信对中间阶级，对国民党内一切派别，当然也对包括已出现抗日倾向或已经出现抗日行动的派别统统排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外，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予以反对。指示信认为“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尽着汉奸的作用。对满洲的反日运动，执行着最可耻最狡猾的策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面上处反对的立场，对满洲的反日运动假装着同情，他们提出援助反日运动的口号和空谈，不仅是为着掩饰自己民族叛徒的真面目，而且是有一定反革命目的”，“挂革命的招牌来行反革命的政策，这是国民党各派别对满洲问题的一致的实质。”“北方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口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及国民党南京派，实际共同的是建立所谓北方独立及变相的第二个满洲国。”对冲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禁锢，打响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序幕的东北义勇军爱国将领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等人，“一·二六”指示信将他们指

责为“阻碍着满洲真正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不但连他们最起码的民族立场都未予承认和肯定，而且把他们当作民族最危险的敌人加以反对。这和要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差得更远。

持“一·二六”指示信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者，往往引用“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再联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得出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论，这是不符合指示信的原意的。

试想，“一·二六”指示信把马占山、李杜、苏炳文这种对日本侵略者有激烈的敌对行动——用武力与侵略者斗争的有产阶级都排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外，怎么可能把那部分对侵略者只抱敌视态度的有产阶级包括在“反帝统一战线”之内呢？况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这只是一句话中的一半，后半句是“因为它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这后半句引用时往往被删去。可见“敌视”的原因只是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竞争者”。“竞争”一词在指示信中多次出现，如日本帝国主义“为着争夺太平洋的霸权，而与自己极大的竞争者美国彼此进行强盗战争”，“为压迫和奴役满洲的中国和其他民众”，一切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竞争着”。显然，“竞争”一词在指示信中的含意是指敌人之间的矛盾和争夺。“竞争者”应是归于敌人的营垒，而并未归于统一战线的盟友之列。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1934年2月22日《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以下简称“二·二二”指示信）批评满洲省委曲解了“一·二六”指示信，其中便有满洲省委“过分的估计了有产阶级‘敌视’日本强盗的作用”，而把这部分人也当作反日的这一条。中央认为这种估计是错误的，这部分有产阶级充其量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目

的，“时刻准备着投降，并且拿着改良欺骗的空谈来掩盖自己投降叛变的企图和事实”。中央对“一·二六”指示信中这部分有产阶级敌视含意的解释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显然仍然把这部分人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这一句话，则实际是“一·二六”指示信中谈统一战线问题两句话中的一句，即“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接着并列的另一句是“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这两句话恰恰又是信中明确申明在叙述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决议的一大段文字中的两句话。也就是说，这两句话是叙述全会决议中的有关统一战线政策。只要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看，只要查一下全会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应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①的规定，就可知道这里仍是下层统一战线，只不过换了个说法罢了。

“一·二六”指示信接着规定了对运用共产国际的下层统一战线必须遵守的四条基本原则。这四条原则本来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但持“一·二六”指示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者取出其中两句：“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头一句中的第二种游击队是指“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受“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曾经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的游击队，只是“在某种程度和范围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1932～1933年，第383页；《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1932年9月版。